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REGISTERED AS A NEWSPAPER FOR TRANSMIS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O CANADA AND NEWFOUNDLAND BY MAGAZINE POST.

SATURDAY, FEBRUARY 26, 1927.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① 沈弘 编译



I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

沈弘 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 1926～1949 / 沈弘编译.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2

ISBN 978-7-5699-0804-6

I. ①遗… II. ①沈…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1926～1949

IV. ①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3634号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 1926～1949（全四册）

沈弘 / 编译

出版人 杨红卫

选题策划 余玲 李强 责任编辑 余玲 李强 孙晓敏

责任校对 徐敏峰 宋春 装帧设计 程慧

营销推广 赵秀彦 陶源源 责任印制 刘银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制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 69499689

规格 880mm×1230mm 1/16

印张 85

字数 1390千字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99-0804-6

定价 398.00元（全四册）

出版说明

《伦敦新闻画报》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其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画报初始就对中华帝国表示密切关注，派驻大量画家兼记者，仅1857至1901年就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它给当时的西方读者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故事，也为后来的历史爱好者们描绘出近代中国众多大事件的珍贵片断，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史料。这也正是它的弥足珍贵之处和它的出版价值所在。

一、本书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第二辑，共四册，收集了1926至1949年间《伦敦新闻画报》上与中国相关的报道，包括文字和2000多张照片。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几篇报道虽未与中国直接相关，但详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所以译者和编辑一致认为应将它们也收录其中。

二、编排上每年为独立一章，小节按照英文登载时间先后排列。小节标题使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英文依照原刊录出。此外，为尽可能呈现原文风貌，本书小节标题以及正文中出现的页码均依据原文未做变动。

三、为了保持图文原貌，图注均依据原刊的英文图注编译。文中“英里”、“英尺”、“英寸”一仍其旧。

四、由于原作者与我们所处的立场不同，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不同，因此本书对于某些具体历史细节的描述和解释，与我们通常的说法或有出入，有的甚至把列强侵略行径、强盗罪恶说成是造福救助，自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陈词滥调。但为忠于原文，对此译者和编辑均未作删改，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同这些说法，也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时会自会鉴别。

五、可以肯定在同时期载有中国图文的西方书刊中，没有一种可以同《伦敦新闻画报》等量齐观。如今我们将这一宗他者所描绘的中国图文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关注。限于条件和编辑水平，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一并感谢沈弘老师为我们从大洋彼岸搜集回来这些珍贵的史料，并亲自笔译全部文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相信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对中国史感兴趣的爱好者的欢迎。

序一 打捞历史碎片

马 勇

一年前，沈弘教授编译出版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既受到读书界普遍欢迎，获得良好销售业绩，也为学界提供了新鲜史料、图片。据个人有限阅读，学界已注意并开始引用沈教授提供的史料，尤其是不可替代的历史图片。现在，沈教授又为读者奉上《伦敦新闻画报》有关中国报道第二辑，图文并茂记录民国历史 1926—1949 年部分。出版社约我在这部分出版前写几句，我在大致浏览了文稿后，觉得很有必要向读者诸君郑重推荐这部书，也非常感谢沈教授的辛勤奉献。

这部书所描述的 1926—1949 年，主要反映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反映近代以来中国变化最剧烈的二十几年。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民国又是政治故事格外多的时代，传媒格外发达，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记录，但历史广角记录显得不足。打捞民国历史碎片，像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大限度聚集外围史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民国历史拼图必将随着更多史料的呈现而日趋清晰。沈弘教授所做的工作，究其本质，就是打捞历史碎片，为重构历史记忆添砖加瓦。

相对而言，《伦敦新闻画报》不论图片，还是文字，比较注意后世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即便涉及中英冲突，比如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对租界、租借地收回，尽管“革命外交”为此行为做了许多理论铺垫，但历史主义检讨，这种“革命行动”对中国信誉还是构成了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也为此与中方进行交涉。《伦敦新闻画报》全程记录了这些事件，其比较克制的报道，比较人性化的图片处理，对中国革命尽量理解，都很值得注意。

至于济南惨案、张作霖被杀、孙中山奉安大典、北平从奉军控制下波澜不惊移交给阎锡山晋军……这些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像在这部书中比较集中且大量以图片语言表现，类似出版物过去还不是很多，相信这一部分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

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本书提供的大量生活史资料。比如“放鹰狩猎”(14)、“抽烟杆的农民”(55)、“家庭生活”(70)、“变革时代的中国姑娘”(88)、“鬼节”(114)、“女演员”(136)、“戏班子”(141)、“摄影猎奇”(143)、“饥荒”(144)、“图兰朵”(163)、“新旧时尚”(188)、“蒙古人的艺术”(192)、“永恒不变的东方,中国老人们在战争和革命背景下的顽强生存”(206),以及“北京的新旧对比”(151)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相对比较新的信息,对我们离开民国不远的人来说,具有天然的亲近感,“放鹰狩猎”、“抽烟杆的农民”,仿佛就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村民。

打捞碎片并不是简单的拼图,打捞本身也在纠正前人误读、误解。在沈弘教授撰写的长篇序言中曾举过几个例子,用更严谨史料证明过去一些解释错了,凡此都是对学术进步的有益推动。

《伦敦新闻画报》是一个有待系统发掘的宝库,其关于中国的记载弥补了中方史料的不足。沈弘教授捷足先登,连续出版了几种译作,期待沈教授再接再厉,为读者奉献更多好书、美图。

2015年10月17日星期六

序二 历史的定格与流动

雷 颐

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一个场景、一个片段立刻被定格，浮动的镜像被捕获，时间就此凝固，成为永久的历史场景与片段。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续不断的“咔嚓”，使一个个孤立的场景、一个个孤立的片段、一个个孤立的镜像显示出内在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凝固的时间重新流动，历史的丰富、深厚与生动就此展现。

瓦尔特·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所说：“只有借着摄影，我们才能认识到无意识的视象，就如同心理分析使我们了解无意识的冲动。”确实，摄影是工业社会对大众生活最有影响的发明之一，其触角从宏大的社会、政治场景一直伸展到普通人生活的最私密部分。它将稍纵即逝的种种影像摄取、封存，作为历史最重要“证据”之一受到空前的重视。甚至还能通过人物无意识的瞬间表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拍摄者”都是西方人，有自己的视角与观点。当然，外来者总有外来者的眼光，这种眼光与“猎奇”不无关系。但反过来，“被拍者”

却也可借此反观自身。因为“身在庐山”有时反而难识自己的“真面目”，一些“我们”自处其中的风俗、礼仪习以为常，认为“理该如此”、“天下”都应如此，因此习焉不察，更不觉得有“记录”的必要。正是外来者的新奇目光，把近现代中国的许多方面“定格”下来，使“往事”并未如烟随时光消逝。历史图片，重新建立了“过去”与“现在”、“他者”与“我”之间的对话。

老友沈弘中西学俱佳，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这种“对话”，致力于“西方人记录的近代中国影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中外图书馆潜心悉心、孜孜矻矻，所藏甚丰。出版了一辑晚清图集后，又集中精力于民国时期图集的搜罗、整理与出版。《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中的数千帧照片，形象、生动而且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段民国的历史。

《伦敦新闻画报》是公认的世界最早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从1857年起，就表现了对中国的关注，到1949年，有关中国的报道已近百年。名为“画报”，

实则是以“新闻照片”为主对世界各地发生事件进行迅速报道的新闻周报。

1926年到1949年，正是中国外患不断、内忧频仍的年代。政治、战争，无疑是《伦敦新闻画报》的主要内容。一页页翻过去，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最多的是军阀和国民党人，偶有共产党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的报道占居主流，但共产党的报道越来越多，最后一两年，有关共产党的报道开始占多数。军阀—国民党—共产党，政权的依次更迭，宛然而现。1948年，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时刻了，有张照片令我印象深刻：一个硕大的信封，邮票一张紧挨一张密密麻麻，粗略数一下，贴了上百张，难怪要那么大的信封，邮票总面值上亿。原来是一封从中国寄往新加坡的挂号信，也就是说，印邮票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邮资的上涨。这种政权还有多少时日？尽在不言中。

如果往前翻，可以看到国民党北伐时的意义风发、抗日战争中的艰苦卓绝……此时全都不再。1926年至1949年，二十几年间国民党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一段历史沧桑，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这二十几年，也是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时期。现代化医院、学校、工厂、铁路、公路……大量涌现；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开叉开到大腿的旗袍成为都市女性的主流服装。在迅速现代化的同时，传统依然强大，都市摩登与市井传统纷然并存，自成一景。生活、习俗、风景、文化、文物，从大上海美国好莱坞电影

广告到遥远偏僻的西藏一个藏族姑娘头饰的细部花纹，都在《伦敦新闻画报》的关注之中。《伦敦新闻画报》更是形象、生动、丰富展示了社会、文化、风俗与艺术的历史画面。

1948年的照片几乎都是国共内战的残酷场景，但在年末的一期中，却刊登了十几幅在战火中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小商小贩，牵只猴子到处卖艺求生的流浪艺人，路边卖绣花枕头仍裹小脚的小女孩……这一栏的标题是：“中国不变的面孔：在内战满地烽烟，但并无粮食配给和积分制的国度保持天朝人的平静”。惊奇于这种平静与生存能力，恰恰表明《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报道中国近百年，但仍无法理解天朝子民的“活着”。

序三 民国史的另一面相

解玺璋

曾经读过沈弘先生编译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书中精美的铜版、木版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他编译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第二辑《〈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 1926—1949》全四册即将出版，出版人嘱我作序，虽知非我所能胜任，但先睹为快的诱惑不可抗拒，我也只好勉为其难。

创刊于 1842 年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主要报道方式的新闻周刊。此时，正当中英鸦片战争进入最后的谈判和不平等条约签订阶段，于是，报道中国就成为刚刚创刊的这本周刊无法拒绝的一种选择。在最初的数十年里，派驻中国的多位画家兼记者，就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幅绘画作品和数十万字的新闻报道，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此前出版的第一辑中有生动而具体的展现。

眼下这部煌煌巨著比前一部规模更大，视野更加开阔，报道也更加深入。其中数百篇文字报道和数千

张新闻摄影作品，全部选译自 1926 年至 1949 年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读者可以想见，这 23 年，无论中国自身，还是中国之于世界，都与清末民初不可同日而语，几乎每时每刻都有重大新闻发生。而此时的画报，不仅在印刷技术上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而且完成了新闻绘画向新闻摄影的转换。摄影方式的便捷和快速，以及信息传播速度的不断提升，都为记者记录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新闻现场，传递新闻图片和报道提供了方便。

画报用影像和文字全面、忠实和生动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当然也包括了中国 20 年代的军阀混战、北伐战争、长达十几年的中日战争，以及日本投降后的国共内战。从沈弘先生选译的这些内容来看，画报对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事件，给予了持续的关注，报道是详实而深入的，且有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固然，这家英国人主办的新闻周刊，对所报道的事件，不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倾向，但它并不因为个人的立场和倾向便损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

实性。这恐怕也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仍对这些报道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的新闻，早已成为历史，而当时的报道，则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尤其当这些叙事来自另一种眼光、另一副笔墨的时候，其历史史料的补充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像我辈读者，历史知识偶有捉襟见肘之处固不能免，读一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记录和看法，也许会弥补我们的先天不足，补充被我们有意无意中忽略或遗忘的内容。事实上，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恰恰是由若干不同的面相构成的。

比如北伐战争，我们已知它是国共联合对北洋军阀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以往的历史叙事多集中在“内政”的角度，其中固然把“反帝”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对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作为却所知甚少。而《伦敦新闻画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却非常详尽，并不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它使我们看到，北伐不仅仅是“内政”，在这里，英美与苏俄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故画报对北伐的报道，也比较多地集中在英、法、美如何

调兵遣将，以保护其在华利益方面。

画报中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报道还有很多，比如中日济南事件；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大众教育；华北人民的反自治运动；卢沟桥事变以及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中日淞沪会战和南京的陷落，等等。篇幅所限，我这里也不能尽数，更难以详述，读者自会通过读书找到自己感到兴趣的东西。谨以我的粗浅介绍，权作此序。

2016年03月16日

序四 我们的历史和他们的眼睛

余世存

沈弘教授编译出版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受到广泛的欢迎，现在他又为我们奉上了《伦敦新闻画报》有关中国报道的续篇。我有幸先睹为快，并在这里向读者报告我的心得。

这部书稿是关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画卷。我相信，他人的眼睛造成的陌生感仍是这部书的魅力之一。尽管我们多少自以为熟悉民国，熟悉现代史，但这自家的历史一经他人讲述，就让我们看到了差异，看到了我们不曾关照的地方。我在翻读时，一度翻来覆去、来来回回地看同一个画面，或看几个相同题材的画面，这些历史细节并非我们陌生或不能想象，但这些历史细节在我们的叙述里，多半是充当了历史的大大小的注脚，顶多属于历史本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编辑眼里，它们都是主角，尽管也有异国风情的猎奇，有对半殖民地国家及其人民的定性，但观看者或叙事者仍是理性的。

就是说，外人看我们的历史，有着较为清晰的文

明理性。因此，对同样历史或场景的观看，呈现出不同的信息。众所周知，贫富分化在现代中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但现代史的读者如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化的印象，那就是贫富的对立、撕裂极为严重，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人心处于不安的状态。而在本书中，贫富相安无事，即使处在 19 世纪 20 年代革命和“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本书也记录存照了那种紧张，但记者眼中的富人家庭生活仍有奢华的空间，人物的情态也是安定的；而穷人、农民、老人，也自有境界，记者甚至专节来记录“永恒不变的东方：中国老人们在战争和革命背景下的顽强生存”，其中皱眉不平者与微笑者的比例是一比七。

这让我多次在一些画面或场景里流连，我意识到，这里的场景提供的信息要丰富一点。跟一个角度、一个观念即可认知历史不同，本书呈现的历史会让我们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它耐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让我们想到，同样在观念，外人的眼光和我们眼光还是有差异的。这一差异用照相机的术语表述，

大概可用jpg格式和raw格式的差异来说明,前者的像素要低一些,对对象的摄取有所失真,信息保存得不全;后者近乎全息,像素高,保真性好。用个体眼光的差异来比较,大概可用儿童、画家、摄影师与普通人的眼睛之差异来说明,前者看到的信息远丰富于我们这些普通人通过观看所获得的信息。

我相信,沈弘教授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的意义之一就在这里,我们以为熟悉自家的历史,但借用外人的眼睛,我们从熟悉中会收获更深刻的东西,从差异化中会收获更丰富全面的东西。比如关于中国人的顽强生存,可以跟本书中七个乃至更多普通人的微笑相印证的,是罗素曾在杭州西湖边看到轿夫们微笑:“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轿子里,被抬过山丘,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到了山顶后,我们停下来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儿。轿夫们立刻并排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又说又笑,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似的。”鲁迅为此感慨:“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

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他人的目光既让我们对熟悉的现代史有一种疏离,又让我们能够明认这是我们的血亲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

只有借助他人的眼睛,我们才有望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我们以为自己跟历史切割开来,但在他人的眼睛里,我们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是他人把碎片化的乱世拼图成为统一的历史的风景;由于一个负责的旁观者的眼睛,我们的“妇女的虔诚”、“疏散儿童”(类似三毛流浪记或流民图)、我们“群居的活人和死人”(难民和坟场)、我们创纪录的洪灾、他们一美元可买五万中国钞票的通货膨胀,等等也能成为现代中国的象征;而鲍罗廷夫妇、萧伯纳先生、林白先生、斯文·赫定先生、贝特兰先生等人在现代中国的介入,让我们恍然现代史已经纳入到全球化史;至于普契尼的歌剧、芝加哥动物园的大熊猫,等等,使我们理解,我们没有自外于文明,文明社会也没有离弃我们。

沈弘教授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意义非止一端。它在诸多历史作品中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在这里，无论我们如何自得或自轻，我们仍为他人的眼睛所看，所关注。因此，人及其国家社会的演进，真正重要的，不是此在的感受，而是存在的状态。这也是赵元任这样几乎纯粹的语言学家仍要喊出存在正当性的原因：“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我相信，读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人能够理解，人家或不免于猎奇，但人家并没有希望我们过着非人的日子，在人家的眼睛里，现代中国即使属于过渡转型，仍有意义的诞生，仍有人和文明的努力。赵元任先生当年对外人说的话，今天更应该对我们自己说，让我们大家共勉。

当然，看与被看历史的演进中，会度过它的不对等阶段，会有平等打量的时候。我们更相信并乐意展望，假以时日，我们中国人看世界、看英国，也能在时间积淀里产生可观的文化产品，供他们“参观”，供他们参考并反身回望自己。

是为序。

2016年元月于北京青年湖

译序

沈弘

自从首辑三卷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于 2014 年 4 月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和媒体给予了好评。这也促使我加快了编译《伦敦新闻画报》后续中国报道的步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第二辑四卷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 1926—1949》又已经排版，准备付印。

首辑三卷本的中国报道截止于 1873 年，按常理新推出的第二辑中国报道应该从 1874 年开始，但是为了配合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我们特意将 1926—1949 这 24 年的中国报道提前整理、翻译、编辑和出版。

跟首辑三卷本相比较，这第二辑四卷本无论在内容、版式和风格上都有较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首辑三卷本中的插图全都是雕印版画，而第二

辑四卷本中的插图则几乎全都是照片，只有少数彩色图画或速写作为点缀。

提到从版画到照片这一明显的转变，我们就必须简略回顾一下《伦敦新闻画报》的早期历史。众所周知，赫伯特·英格拉姆在创办《伦敦新闻画报》和使这个以图像来报道新闻的周报在早期大获成功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聘请了当时最好的编辑和画家，而后者又发明了当时最先进的雕版木刻技术。不幸的是，1860 年 9 月 8 日凌晨，英格拉姆携长子小赫伯特在北美旅游期间，因其乘坐的游船在密执安湖上沉没而一起遇难，当时他仅 49 岁。

赫伯特·英格拉姆有三个儿子，当他与长子一起出事时，次子威廉和三子查尔斯年纪尚幼，分别在念中学和小学。12 年后，当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兄弟俩共同出任



赫伯特·英格拉姆



威廉·英格拉姆

查尔斯·英格拉姆

了《伦敦新闻画报》的主管。在前30年当中，哥哥扮演了主要的角色。1901年威廉退休之后，查尔斯独自担当起了管理该杂志的重任，又继续干了30年，直至他于1931年去世为止。

威廉·英格拉姆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小时候，他在法国上寄宿学校。父亲遇难时，他正在英国著名的温彻斯特公学念书。随后他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并以应用科学专业的第一名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获得了律师资格，但他并没有去执业。25岁时，他便与弟弟一起担当起了执掌《伦敦新闻画报》的大业。跟父亲一样，威廉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并且兴趣广泛，喜欢旅行和收藏，酷爱户外运动，甚至还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一批鸟类学家之一。他见多识广，曾是巴黎公社起义的目击者。在他主持《伦敦新闻画报》的30年中，该杂志报道过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次战争，包括在中国爆发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剑桥大学应用科学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威廉自然十分关注图像印刷技术方面的革新。在他执掌《伦敦新闻画报》的时期，该杂志在图像印刷技术上有两个重大的突破：首先是三色版印刷技术的采用，用通俗的说法来解释，也就是用蚀刻铜板取代了木刻雕版，其效果就是线条和构图更为精细，色彩和光影层次的

表现力更为丰富。威廉继承了父亲对于艺术效果精益求精的传统，聘用最好的画家，采用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在这方面迄今还流传着不少轶事佳话。在1887年12月5日那一期迎接圣诞节来临的专刊中刊登了一张名噪一时的彩色画作，题为《吹肥皂泡》。据说光是为了这张画，威廉就支付了画家约翰·米莱爵士3000英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镑非常值钱，跟如今英镑的比价约为1:80。换言之，该杂志的老板仅仅是为了在一份普通新闻周报中刊登一张插图，便支付了相当于如今24万英镑的天价。这事要是放在今天，几乎难以想象。

《伦敦新闻画报》在印刷技术上的第二项技术突破是采用了沃尔特轮转印刷机来印刷该杂志。过去老式的印刷机必须一张一张地印，而且需要手工排版和



《吹肥皂泡》

印刷，速度自然相对较慢。而沃尔特轮转印刷机实现了完全机械化的印刷方式，因此大大提高了报纸杂志的排版和印刷速度。由于是威廉的报社率先采用了这项先进的印刷技术，所以在业界它也被称作英格拉姆

轮转印刷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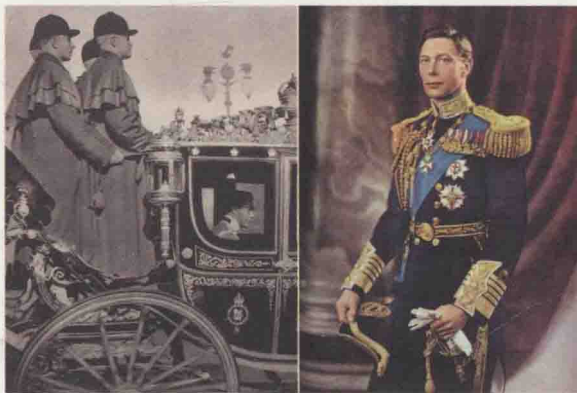


布鲁斯·英格拉姆

1900年，威廉的次子，23岁的布鲁斯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伦敦新闻画报》的主编。他在这个职位上整整待了63年，

除了“一战”期间他因服役在外三年之外，几乎就没离开过这份祖传的家业。因此他对于该报的贡献甚至比叔父查尔斯更大。20世纪的前半世纪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爆发革命和战争最频繁的50年，光是发生在中国的就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20年代的军阀混战、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以及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等。而《伦敦新闻画报》用图像最全面、最忠实和最生动地记录了这一时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布鲁斯继承了父亲和祖父办报的优良传统，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布鲁斯执掌《伦敦新闻画报》的时期正好是照片逐渐取代版画的一个过渡期。他所率先采用的一种新型印刷工艺被称作“轮转照相凹版印刷”。这种新型印刷机的优点就是油墨表现力很强，色调丰富，颜色的再现力强，印刷数量大，应用纸张范围广泛等。当然，实施这种印刷新技术在当时并不容易，尤其是制版工艺复杂，印刷成本较高。然而英格拉姆家族管理《伦敦新闻画报》的共同特征就是不遗余力地追求质量

与完美，有时为了印刷技术的改进和革新，即便增加成本也在所不惜。从下面这两个随手拈来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该报的印刷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



乔治六世的这两张照片采用了轮转照相凹版印刷技术

回顾英格拉姆家族执掌《伦敦新闻画报》的头一个世纪，我们仿佛是在读一本浓缩的图像印刷技术的发展史。在英格拉姆家族三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之下，这部杂志虽然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但却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用图像来报道新闻的一个平面媒体。

二

从广义上说，《伦敦新闻画报》是一份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但它并非一份普通的画报，而是以报道世界各地最新发生事件为主要目的的新闻画报，所以必须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在该报刚创办的19世纪中期，只有帆船来往于欧亚大陆，所以来自中国的消息和图片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传到英国。随着轮船的发明和普及，这一时间在19世纪末已经被缩短到了一两